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2.002

# 中国共产党人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 理论创造与实践探索

欧明容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 “三大差别”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辩证分析不同性质社会中“三大差别”的矛盾性质、发展趋势和解决之道,探索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缩小“三大差别”进行了接续探索:正确分析我国“三大差别”的发展状况和趋势,确立扭转“三大差别”扩大趋势的目标,探索缩小“三大差别”的现实途径和方法。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时代缩小“三大差别”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缩小“三大差别”进行了伟大实践,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

**关键词:** “三大差别”; 中国共产党人; 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 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3)02-0008-08

**引用格式:** 欧明容. 中国共产党人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理论创造与实践探索[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2): 8-15.

## The Theoretical Crea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Narrowing and Eliminating the “Three Major Differences”

OU Mingro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ree major differenc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omrade Mao Zedong as their chief representative, Chinese Communists dialectically analyzed the contradictory na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d solutions of the “three major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societies, and explored how to narrow and eliminate the “three major differences” in socialist China which used to be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lagg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th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as their chief representatives, have continued to explore ways to narrow the “three major differences”. They correctly studied and judged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China’s “three major differences”, set the goal of reversing the widening trend in differences, and explored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reduce differences. Chinese Communists, with Comrade

收稿日期: 2023-02-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研究”(22ZDA026)

作者简介: 欧明容(1989—), 男, 安徽五河人, 安徽师范大学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Xi Jinping as the chief representative, propose in the new era that narrowing the “three major differences” must follow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here to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On the basis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objective law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has led the whole party and the people of all groups in China to carry out great practice and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narrowing the “three major differences”.

**Keywords:** “three major differences”; Chinese Communists;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the new era

“三大差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差别的简称<sup>[1]</sup>。消灭“三大差别”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之一；他们深刻剖析“三大差别”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危害，辩证指出“三大差别”产生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出发，探索消灭“三大差别”的途径和方法，初步形成了“三大差别”理论<sup>[2]</sup>。围绕这一理论，学界对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究：一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存在的“三大差别”，二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三大差别”，三是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的问题。其中，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成果极少。基于此，本文探究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理论创造与实践探索。

## 一、毛泽东对“三大差别”理论的发展与运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在继承前辈经典作家关于消灭“三大差别”的理论的基础上，对“三大差别”理论进行了创新性发展，为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进行了丰富实践。

### （一）“三大差别”的矛盾性质、发展趋势和解决之道不同

毛泽东认为在不同性质的社会中，“三大差别”的矛盾性质不同、发展趋势不同、解决之道也不同。

其一，不同性质的社会中“三大差别”的矛盾性质不同。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差异就是矛盾，差异只是矛盾表现得不明显的状态，

对抗也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三大差别”作为三大社会矛盾，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存在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之别。“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sup>[3]335-336</sup>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的对抗性质决定了由此产生的其他矛盾如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体之间矛盾的对抗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质也决定了资产阶级统治下城市对乡村的掠夺、工业对农业的掠夺、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掠夺。这也决定了掠夺与反掠夺、剥削与反剥削的对立状态将会长期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生产资料实行公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了一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体劳动之间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sup>[4]211</sup>。同时，毛泽东辩证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三大差别”虽然表现为非对抗性，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转变为对抗性质的矛盾，然而这又是局部、暂时的现象，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予以解决。

其二，不同性质社会中“三大差别”的发展趋势和解决之道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sup>[3]311</sup>。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无法调和，必然导致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由此也将导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抗加剧，当这种对抗发展到极限时，双方必然会采取暴力手段，以社会革命的方式解决这种差别和对立，从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社会主义社会的“三大差别”是非对抗性质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制度本身得到解决。“社会主义国

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sup>[5]119</sup>“三大差别”作为三大社会矛盾,其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果不平衡过于突出,就会导致它们之间的矛盾激化。因此,必须在尊重不平衡的绝对性的基础上,追求相对平衡的状态。社会主义制度为调节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之间的不平衡提供了可能,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然而,所有制问题的基本解决并不意味着“三大差别”会自动缩小和消灭,为此必须解决管理和分配的问题,也就是改革管理体制和分配体制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它们之间可能出现新的不平衡,需要不断地对其进行调整,不断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社会关系,使其保持相对平衡,使它们之间的差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其三,消灭“三大差别”的本质在于消灭不平等、不公平的状态。差别也是一种矛盾,只是双方或偏重于同一性或偏重于对立性。偏向同一性时,这种差别的对抗性不明显,表现为一种平和共处的状态;偏向斗争性时,这种差别表现为分化对立的状态。毛泽东坚持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三大差别”的消灭问题,认为消灭“三大差别”存在一个相对和绝对的问题。在批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提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依然是要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量的变化和部分质的变化,因此必然还会迈入新的阶段。理解他的观点,也就可以理解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三大差别”仍不会完全消失的观点,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某些差别可能依然存在,或者将会产生新的差别,所以解决“三大差别”始终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的。毛泽东既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也认识到消灭“三大差别”并非消灭一切差别,而是要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之间的对抗性,消灭它们之间的不平等、不公平之状态。

## (二)探索工农结合、城乡兼顾、脑体结合的具体路径

在毛泽东看来,走工农结合、城乡兼顾、脑体结合的发展之路,是缩小和消灭社会主义中国“三

大差别”的有效途径。围绕如何实现工农结合、城乡兼顾、脑体结合,毛泽东在实践方面做了诸多探索。

第一,协调发展工业和农业,致力缩小“剪刀差”。新中国初期,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制裁,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政策。同时,我国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生产组织形式,并采取计划经济模式进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以“剪刀差”的方式为国家工业和城市建设提供必需品。通过这种方式,我国工业化建设迅速推进,但过度的计划经济模式和工业化发展模式,超越了同期生产力水平,造成我国工农业比例失调,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凸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积极探索工农业协调发展之路。一是协调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之后又将其发展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的国民经济总方针。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党和国家对农轻重的比例进行多次调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在农村发展工业,办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实体。毛泽东主张发动地方搞工业化建设,在农村公社办工业。虽然村社企业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了农村经济形式。这也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是制定和实施工农业商品等价交换原则,致力于缩小“剪刀差”。过大的“剪刀差”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需要完善定价机制,贯彻等价交换原则。为此,党和国家采取了适当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村工业品供应等措施,这对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统筹发展城市和乡村,促进社会资源公平分配。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sup>[6]</sup>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再次表达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观点,并提出“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sup>[5]128</sup>。由于历史的原因,城市在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等方面普遍优于农村地区。这既是工农差



别、城乡差别的主要表现，也是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原因。基于城乡公共服务不平衡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考虑，毛泽东主张将部分社会资源向乡村重点倾斜。在医疗卫生方面，制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培养了一支农村医疗工作队伍，逐步建立起县乡村三级医疗保障网。在文化教育方面，兴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建立了一支农村教师队伍，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在基础设施方面，拓荒垦田、修桥铺路、兴修水利，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这些举措使农村文盲率得到明显降低，医疗卫生得到明显改善，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平衡的问题得到缓解。

第三，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探索脑体结合的新路径。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及剥削制度的消除为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奠定了政治基础，而公有制经济的建立为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提供了经济基础。然而，在无产阶级执政初期，它们之间的对立并没有完全消失。因此，必须探索脑体结合的具体途径，促使它们之间的对立消失，使二者处于平等的状态。在毛泽东看来，劳动者素质决定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需要接受社会主义教育，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知识分子、工厂管理者等脑力劳动者需要接受劳动再教育。通过这种结合，消除体力劳动者由于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和脑力劳动者脱离工农群众和工农业生产而带来的限制，从而提升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创造出更大的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缩小脑体差别的重要方式。他将上述思想付诸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倡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提出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他指出：“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sup>[4]399</sup> 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是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脑体结合的基本渠道。他号召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也是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将劳动与教育结合起来；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深入生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提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和劳动制度，提高工农群众的知识文化素质，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这些探索在实践操作中存在一些不足，但为促进脑体结合

提供了重要借鉴。

##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缩小“三大差别”的理论与实践

“三大差别”在新阶段出现了新变化，突出表现为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虽然表现形式略有不同，但本质上都反映了不平衡、不平等的状况。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但“三大差别”依然突出且有扩大的趋势。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三大差别”的新情况、新趋势，并从解决问题的层面致力于缩小“三大差别”。

### （一）正确分析我国“三大差别”的发展状况和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是“三大差别”并没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缩小或者消亡，在一定时期甚至出现了扩大的趋势。以“三大差别”的重要表现——收入差距为例，从1978年到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至24127元，增长至70.3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4元增加到8389元，增长至62.6倍；城乡收入比长期维持在3倍左右。从收入群体分布来看，从事脑力劳动的行业群体和从事体力劳动的行业群体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新情况新趋势进行了深刻思考和分析。他们认为，我国“三大差别”出现扩大的趋势，既具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又具有复杂的现实原因；既有一般性原因如生产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也有特殊性原因如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长期存在。

其一，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在邓小平看来，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分配方式、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等还处于较低水平，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三大差别”在短期内并不能得到很好解决。1978年2月9日，邓小平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便预判“三大差别”在20世纪末并不一定显著缩小<sup>[7]</sup>。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我国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策略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率先发展起来的政策。在这种发展策略和

政策引导下,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也带来了不均衡的问题,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换言之,改革开放改变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然而此时的社会生产力还不能为全社会提供充裕的物质资料 and 消费资料。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不均衡的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其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加剧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支持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我国在城乡治理上采取了城乡分治的模式,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投资政策、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等。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逐渐形成,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日益明显。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依然存在。这导致城乡要素无法充分实现双向流动,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又出现“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形成了“双二元结构”的格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

其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按照市场规律,由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三大差别”。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中,资本追逐利润,生产追求效率。农业、农村由于自身的生产局限性,生产效率远低于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要素和资源不断流向工业部门和城市,导致农村持续发展的动力减弱。城市土地国有制以及市场化运作使得城市居民收入和财富迅速增加,社会资源和社会福利向城市倾斜的政策也使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以来,较为宽松的管制措施和市场环境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壮大,但也导致不同群体收入差距的扩大。大量的人口、资金汇聚城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铺开,迅速推动了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升级与转型,同时拉开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

## (二)探索缩小“三大差别”的现实途径

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看来,逐渐扩大的

“三大差别”将会对政治、经济、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必须探索缩小“三大差别”的现实途径。邓小平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通过改革开放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先富带后富来实现共同富裕,以达到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目的。江泽民和胡锦涛继承了邓小平的战略构想,把缩小“三大差别”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侧重于从实践层面解决问题。总的来说,他们探索缩小“三大差别”的现实途径和重要举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为缩小“三大差别”奠定物质基础。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消灭“三大差别”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基础。在邓小平看来,“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sup>[8]265</sup>,这是因为随着实践的发展,人对生产力会产生新的更高需要,生产方式只有不断调整才能满足人的新需求。另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还需要配套的体制机制和实施主体,而这些方面会在实践中产生偏差,所以必须不断改革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新要求。

“三大差别”是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通过发展去解决。改革开放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缩小“三大差别”的必由之路。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sup>[8]255</sup>

二是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接力解决“三农”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中之重。邓小平提出了农业改革和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并推动实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方式,将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调整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行的经济机制。20世纪末,江泽民初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想,确立了农村改革市场化取向以及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sup>[9]</sup>。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从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加强农村精神文明等方面推进新农村建设,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村生活环境和农民生活水平。随着农业农村改革的推进,我国农业生产力得到



极大释放，农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农村面貌发生明显改变。

三是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邓小平立足于新时期城乡建设实践，形成了以改革促进城乡互动、优势互补，从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思路。在江泽民看来，推进城镇化还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市和农村，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他主张运用市场机制，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来发展小城镇，同时把小城镇发展同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科技型农业结合起来。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将扭转城乡差距扩大趋势作为短期目标，把消灭城乡差别、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作为长期目标。为此，党和政府致力于促进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更加公平合理分配，在收入分配、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深化改革，通过一系列举措有效遏止了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的扩大。

四是重视科学教育事业，促进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在如何缩小脑体差别的问题上，邓小平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观点，探索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两者更好地结合。邓小平认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命题，作出发展科技和教育的战略部署。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胡锦涛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sup>[10]</sup>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建设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出台一系列促进教育制度规则公平的规章制度，加强依法治校、依法治教。

###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缩小“三大差别”的理论创造与伟大实践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三大差别”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新时代缩小“三大差别”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个基本

原则”。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和各族人民为缩小“三大差别”进行了伟大实践，并取得了伟大成就。

#### （一）新时代缩小“三大差别”的基本方略和基本原则

新时代缩小“三大差别”的首要问题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历史经验，一方面考察和研究了其他国家的情况，提出新时代缩小“三大差别”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奠定了制度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实行公有，消费资料实行按劳分配，为缩小“三大差别”提供了可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大程度上保证社会公平。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三大差别”问题归根结底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逐步加以解决，只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才能有效控制和缩小“三大差别”。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三大差别”的对立性并没有消除，贫富分化更加严重，盲目模仿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城镇化发展道路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为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进行了接力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人民至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

新时代缩小“三大差别”必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同时必须坚持四个基本原则，这是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保障。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sup>[11]</sup>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历史任务中发挥领导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和革命性。第二，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既要发挥党的领导

核心作用,也要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人民群众是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主体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sup>[11]8</sup> 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不是靠理论阐释或逻辑推理得来的,而是以自己的社会贡献与历史作用有力证明的。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首先要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只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才能成为可能。第三,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平衡是就结构而言的,不充分是就程度而言的,“三大差别”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果和体现。新时代,我们要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相辅相成,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才能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只有高质量发展,才能促进共同富裕<sup>[11]141-144</sup>。第四,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的目的是利用市场经济规律提高经济效率,服务和社会主义。因此,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利用市场手段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要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最大限度减少市场经济的弊端<sup>[12]64</sup>。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关键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为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防止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盲目无序扩张。

## (二)新时代缩小“三大差别”的伟大实践和伟大成就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缩小“三大差别”应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首先需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促使资源向利润率高的地区转移,让城市的比重上升、乡村的比重下降。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城乡之间既有斗争性又有同一性,城乡长期共生共存也是客观规律。应该客观看待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消失的问题,即“别”依然会有,但“差”要消除,终极目标应该是逐步消除农民与市民在实质上的差别和身份上的巨大落差<sup>[13]</sup>。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客

观规律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和各族人民为缩小“三大差别”进行了伟大实践,并取得了伟大成就。

其一,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探索城乡融合新道路。“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sup>[14]256</sup>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的理念,作出脱贫攻坚的重大决策部署。经过8年努力,精准扶贫直接减贫效果明显,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贫困人口收入持续增加,生活质量明显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不断提升,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乡村振兴战略是对精准扶贫的承继和深化,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和解决相对贫困的重要战略。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按照客观规律推进乡村振兴:一方面走新型农村合作化道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一方面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多元化促进乡村振兴<sup>[14]259-260</sup>。

其二,发展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导向,探索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sup>[12]188</sup> 当前,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突出,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这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围绕这一问题,党中央提出统筹布局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从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着手,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和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的发展目标<sup>[15]</sup>。

其三,促进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开创共同富裕新局面。“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sup>[16]</sup>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坚持以

下路径：一是保持经济发展的合理区间，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相结合。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即“做大蛋糕”；同时需要进一步协调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即“分好蛋糕”。二是促进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关乎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人们的幸福指数。促进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三是重点发展农村地区，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关键看农村能否发展起来。当前，重点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在现实条件下应当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基础条件。

其四，提倡发展数字经济，探索缩小“三大差别”的新渠道。发展数字经济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以及区域差距的新途径。一是可以促进知识和信息资源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传播，有利于信息共享和传播；二是能够带动农村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村提供了更多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可以帮助农民优化生产结构，丰富农民收入来源；数字经济有助于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引进来”与“走出去”，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自由、平等、高效流动。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发展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全面部署数字经济发展。例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列成篇，以突出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在乡村深化4G普及和5G应用，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综上所述，在继承前辈经典作家“三大差别”理论的基础上，毛泽东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如何正确认识和如何缩小社会主义社会的“三大差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接力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式道路。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理论和实践，可以为新时代缩小“三大差别”提

供理论依循和实践导向：一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二是改革和完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促进生产力发展；三是努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四是将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研究和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奋斗历程，有助于我们明晰未来的奋斗目标，更进一步协调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向前进。

#### 参考文献：

- [1] 许涤新. 简明政治经济学辞典 [Z].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8.
- [2] 王向清，欧明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三大差别”理论的逻辑展开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1)：16-24.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7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8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7.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05.
- [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68-269.
- [10]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24.
-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3] 习近平. 之江新语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88-189.
-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5] 习近平.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N]. 人民日报，2015-05-02(1).
- [16] 习近平.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俞正声张高丽出席 [N]. 人民日报，2015-10-31(1).

责任编辑：陈璐